

佛
教
邏
輯

〔俄〕舍爾巴茨基 著
宋立道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佛
教
邏
輯

〔俄〕舍爾巴茨基 著
宋立道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佛教邏輯 / (俄羅斯) 舍爾巴茨基

(Stcherbatsky, F. T.) 著 ; 宋立道譯 . — 貴陽 : 貴州
大學出版社 , 2013. 8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05-4

I . ①佛… II . ①舍… ②宋… III . ①因明 (印度選
輯) — 研究 IV . ① B81-093. 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199912 號

佛教邏輯

著 者 : [俄] 舍爾巴茨基

譯 者 : 宋立道

責任編輯 : 信 實

出版發行 : 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 : 貴陽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 23

字 數 : 504 千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7-81126-605-4

定 價 : 128.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係調換

電話: 0851-5981027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爲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爲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爲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布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爲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公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爲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公元之初，佛教并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爲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公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蘊。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想要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譯者說明

費多爾·伊波里托維奇·舍爾巴茨基 (Fëdor Ippolitovich Stcherbatsky 1866—1942) 是在佛教學研究方面影響過一代風氣的學人。他是著名的印度學和佛教學專家，又是印度哲學和藏學文獻的權威。生前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列寧格勒大學教授，並且是歐洲三個著名學術協會——倫敦皇家亞洲學會，巴黎亞洲學會和柏林東方學會——的會員。

舍爾巴茨基於 1866 年 9 月 15 日出生於一個俄國貴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時代便掌握了德、法、英三種語言。1884 年他進入彼得堡大學，師事著名梵語學者米納耶夫 (Минаев)，以後又曾問學於米納耶夫的高足奧登堡 (Ordenburg)；同一時期，他還曾從德國學者 F.A. 布勞恩 (Braun) 學習哥特語、古代北歐語、古代德國高地語；另外還研習過教會斯拉夫語等，充分顯示出他的語言才能。1889 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彼得堡大學。之後，前往奧地利維也納師從印度學權威比累爾 (Büler) 進修印度文學，攻讀梵文經典波你尼 (Panini) 的語法及法論和題銘學等，從中深深感受了印度古代學者精於分析的學風。梵語當中，「文法」本義即為「分析」；而「正理」本義為「方式」，指釋讀經典的方法。1899 年參加羅馬舉行的東方學者集會後，他應邀往波恩同雅各比 (Jacobi) 教授研究梵語論書，對雅各比直探原典，重視語言分析和

思想源流的學風深為膺服。1900年歸國後，執教於波得堡大學東方語言學系，與著名學者奧登堡共事。同一時期，開始研究北方一系的佛教文獻，注意到了藏文文獻的重要性。

舍氏對文獻學的深湛功力與他從語言學入手，進而研究文學，再轉至哲學研究的學術路子是分不開的。他曾在大學中開設研究迦利陀莎《雲使》和沙恭達羅戲劇的課程。他的學風接近雅各比和比累爾。依據其深睿銳利的哲學頭腦，輔以淵博厚實的語言學素養，他對印度思想往往有精確而嚴密的理解。

1910—1911年，舍爾巴茨基曾往印度實地考察。於孟買與印度學者討論著那教經典和《法論》等；於加爾各答和貝那勒斯苦心搜求梵文哲學本子，其中多有正理派著述。在此期間，他在塔爾吉林格拜見了第十三世達賴，並獲得所饋贈的大批藏文抄本。

從印度歸來，他致力於對世親《俱舍論》和世友釋本的研究。作為其研究成果，發表了《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義》一書。該書被認為是對小乘佛教哲學體系的精闢而中肯的批判。他在佛學方面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佛教的涅槃概念》^[1]。該書是對大乘佛教思想的總體把握，其中往往涉及婆羅門哲學及梵藏語言問題，顯示了其人的廣博才識。

《佛教邏輯》（兩卷本）是舍氏最後一部巨著。它出版於1930—1932年間，最初以英文寫成。如果考慮到舍氏對法稱的研究始於1900年，並曾以俄文出版過《晚期佛教徒學說中之認識論和邏輯》（Теория по знанию и логика по учению по

[1] 兩書均於1994年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並分別易名為《小乘佛學》和《大乘佛學》。

энейших буддистов, 1903—1909), 那麼,《佛教邏輯》就是前後約 25 年的研究成果。這部作品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綜合了佛教史、佛教哲學和梵藏文獻研究的當時的重要成果,縱觀東西方邏輯思想的發展,選擇了三位佛教思想家——陳那、法稱、法上為對象,通過東西方邏輯的比較,對晚期大乘佛教的認識論邏輯作了充分估價。該書問世半個多世紀了。它一直享有佛教學研究中權威著作的地位。直至今天印度的印度學學者們也將它奉為劃時代的作品。

譯者首次讀到這本書是在王森先生和虞愚先生的指點下,目的是為了準備一篇有關因明的碩士論文。當時邊讀邊摘譯,待論文完成時,基本上譯完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一部分。以後又斷斷續續地補譯改訂。五年中間,三易其稿。儘管如此,譯文仍難讓人滿意。譯者誠懇期待批評。為便於閱讀,這裏順便說明幾點。

由於舍爾巴茨基在書中堅持採用比較哲學研究的方法,他又用英文寫作,所以好些概念只能借用西方哲學術語表達,而他的研究對象恰恰又是印度思想背景下的佛教邏輯。為此譯者對某些重要的術語如何漢譯,往往躊躇再三,不敢下筆。因為就是原著者自己也認為:要找到一個西方哲學術語等值地表達印度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任何辭彙,尤其哲學辭彙都是它依存的哲學系統的一部分,孤立地、簡單地移借難免造成誤解。對此,舍爾巴茨基是有深刻瞭解的,他在書中顯然並未拘泥於一個概念的本來內涵(其實就是在西方哲學中,同一概念名稱對不同哲學家往往也有不同的意義),而只求大致為東西兩大系統通融。例如,對於佛教哲學中的終極真實者(paramārthasat),他便認為是可以用實在、存在、實體、實質、本質等來說明的。因而在他的概念系統中,諸如 paramārthasat、vastu、sat、dravya、dharma 都是可以互換的。

譯者在譯文中也就在等值意義上使用「實在」與「真實」兩者，並不以為二者有任何區別。

另外，經量部的認識論——若以舍氏的眼光看，應稱為批判性的實在論——或批判的反映論，兩個名稱側重了不同的哲學含義。前者表示外部世界的最終極真實性對於認識活動說來，是給懸置了的。它僅僅強調對象（外境）是認識不可缺少的因素，*arthakriyā-sāmarthya-laksanam*（具有境之功能的自相）。僅在此意義上，它是實在的。後一反映論（*sārūpya-vāda*）的名稱，則說明認識過程中並沒有實然地直接把握對象，而只是在意識中生出了對象的影像。由於認識論是佛教邏輯中包含的一大特色，這裏多加幾句說明。首先，譯者對於影像並未作進一步細分，因為若按西方認識心理學來區分的印象、心象、表像等都含有印度人「影相」之外的意義。譯者只是採用「表像」這個概念，並以它來對譯梵文為 *pratibhāsa*、*bhāsanam* 和 *ākāra* 的概念，儘管「表像」嚴格說來已包含了理智加工過了的感覺印象的意義，而印度人原本所指的只是簡單的單純的近乎直覺性的反映。另外，反映（*sārūpya*）在舍氏的書中譯成 *conformity*（符合），譯者譯為「相似相符」，就認識過程言，它指概念形成中忽略個別者差異以及判斷形成中主謂統一的過程。這是經量部哲學的要點。玄奘的「帶相說」指的便是這種心理過程。從梵文形式上看 *sārūpya* 可分為 *sā* 的首綴與 *rūpya*（形相、形式、形色），*sā* 有三個意義，即：1) 表現為……，含有……，具有……2) 同……一道的，帶有……的；3) 屬於……同一類的。因而 *sārūpya* 說明認識過程時便表示了：1) 主體意識中生出並包含對象的形象（影相）；2) 作為最初的認識來源（能量）的感性能力必然是能帶相（對象的形式）的；3) 當知

性介入，著手處理感性材料時，必然有一個將雜多統一，即格式化、形式化 (formation) 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舍爾巴茨基的英譯「conformity」是恰當的，因為這個詞就有「與某一形式同一」的意義。由於帶相說在瑜伽經量部哲學（佛教邏輯便是其主體）中的特殊意義，譯音在此錄上《頌釋補》中一個頌，以供讀者參考——「智中境象，如青黃等。乃外境於識中引生。境象即能量。識中影相與外境有關，故爾說青黃等色是外境，自證是果。外境即所量」。本書第 458 頁，第 1 註對此有說明。

另外，由於原著者認為陳那的認識論體系與康德哲學有驚人的相似，所以傾向於多用康德的術語，尤其是用他的 Ding-an-sich 來說明佛教的 svalaksana（自相）。譯者在這種情況下稱 Ding-an-sich 為「物自體」；而在討論外部世界真實性時，譯者將與 Realität（實在）和 Sachheit（物）相關聯的 Ding-an-sich 譯成「自在之物」。實則兩個譯名為一回事。最後，原著者在闡述佛教的剎那存在論時，創造了一個術語「point-instant」（= Kraftpunkt）。他的意思是指這是空間與時間觀念生出的依據。譯者譯成「點剎那」，保留原含義。

最後，建議讀者先閱讀書末的「邏輯主題索引」，以對術語和佛教邏輯體系有大致的瞭解。

宋立道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書名縮寫

Anekāntaj. Anekānta-jaya-pataka of Haribhadra
(Jain)

師子賢(耆那)的《非一勝者幢》或《多元的勝利旗幟》

AK Abhidharmakośa.《阿毗達磨俱舍論》

AKB. Abhidharmakośabāśya.《阿毗達磨俱舍釋論》

BB BibliotecaBuddhica.《佛教文庫》

BI BibliotecaIndia.《印度文庫》

CC 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Dharma (London, 1923, A.R.S.). 舍爾
巴茨基《佛教的中心概念及「法」的意義》(倫敦, 1923, 皇家亞洲
學會), 中國社科版本書譯名為《小乘佛學》

CPR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y Kant, transl.
byMarxMüller.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馬克斯·繆勒英譯本

ERE EncyclopaediaofReligionandEthics.《宗教和倫理百科
全書》

GGN Göttinger Gelehrte Nachrichten.《哥廷根學術新聞》

IBQ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Caloutta).《印度歷史季
刊》(加爾各答)